

《玉米》的狂欢化语言风格

姜 珍 婷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中文系 湖南 娄底 417000)

[摘 要] 《玉米》是当代优秀作家毕飞宇的典范作品,这部作品本色天然、幽默诙谐的语言风格暗合了前苏联文艺理论家巴赫金的狂欢化的叙事诗学。具体而言,《玉米》以它多声部的叙述、反讽的手法、粗俗的取象体现了巴赫金所说的“狂欢化文学”的特征。

[关键词] 《玉米》; 语言风格; 狂欢化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1)03-0106-03

《玉米》是当代优秀作家毕飞宇的典范作品,在这部言仅五万字的中篇中作家以他对人世、人性深刻的洞察和外枯中膏、似淡实腴的文笔为我们叙述了一个时代,刻写出了这个时代的灵魂。通观整部作品,作家叙事张弛有度,繁简适宜,细节描写精深微妙而又张力十足。五万字的篇幅给读者的感受如行云流水而又回味无穷。这样的审美快感当然首先源于作品那本色天然、幽默诙谐的言语风格。这种语言风格暗合了前苏联文艺理论家巴赫金的狂欢化的叙事诗学,作家以这样的语言消解着对乡村的诗意叙写,在逃离主流意识的民间话语中确立了自己的独特的言语风格,表达着一个有独立意识的作家对时代流变的冷静思考。

《玉米》的语言在以下三个方面体现了巴赫金所说的“狂欢化文学”的特征。

一 多声部的叙述

“复调”理论始于巴赫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结构的分析。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一书中,巴赫金认为,陀氏的小说创造了一种作者(自我)与其主角(他者)的平等对话、交流,使不同主体间构成了多声部、双声部的复调形式。陀氏刻意改造了传统认可的作者和人物的关系——他放弃了万能君主或乐队指挥中心的位置,贯通了主宾或你我意识的界限,创造出不是无声的奴隶,而是自由活动的人物,因此,作品成功地挖掘出了主人公的自身价值,赋予他真正的自由与独立。毕飞宇的《玉米》总体上采取的是外在的全知视点,但在叙述中,视点不时会转移到人物身上,不时会以人物的口吻说话,短则一句,长则数十句。这种在全知视点中适时地夹杂着人物视点的叙写方式让作品中的各色人物逃离了作家主体话语的遮蔽,能动地展示着自我的生命本真。就在这种众声喧哗的热闹景象中作家为我们展示了形

形色色的民间话语形态,让作品呈现出狂欢的色彩。

“施桂芳一只手托着瓜子,一只手挑挑拣拣的,然后捏住,三个指头肉乎乎地翘在那儿,慢慢等候在下巴底下,样子出奇地懒了。施桂芳的懒主要体现在她的站立姿势上,施桂芳只用一只脚站,另一只却要垫到门槛上去,时间久了再把它们换过来。人们不太在意施桂芳的懒,但人一懒看起来就傲慢。人们看不惯的其实正是施桂芳的那股子傲气,她凭什么嗑葵花子也要嗑得那样目中无人?”这是《玉米》开篇不久的一番话,写的是施桂芳因为终于生下了儿子而自满和自傲的情节。前面都是作家叙述的口吻,但“她凭什么嗑葵花子也要嗑得那样目中无人?”这一句,陡然换做了人物的口吻。这“人物”当然不是哪一个人,而是村里的众人。这句话是以村中众人的口吻说出的。接着,小说仍采取作者的叙述口吻,但紧接一句“她的男人是村支书,她又不是,她凭什么懒懒散散地平易近人?”却又以村中众人的口吻说出的,这是作家用百姓的眼光在看取官场,在塑造王家庄群众形象之余,让读者在平淡的直述中听到了异调,引发了他们的关注和思考。这样的叙写方式不时在作品中出现,如续篇《玉秀》中有这样的叙述:“财广家的几年之前做过王连方的姘头,事发之后财广家的还喝了一回农药,跳了一回河,披头散发的,影响很不好。”

这里,前面几句话都是作家在叙述,但“影响很不好”这一句却是王连方对财广家的服毒跳河的评价,这是典型的20世纪70年代的官方话语方式,王连方这个王家庄的最高权利掌控者就是以这样居高临下的话语霸权在操纵王家庄百姓的命运。再例如,《玉秀》中这样写公社革委会副主任郭家兴:“‘中年男人三把火,升官、发财、死老婆。郭主任赶上了。’这是一句老话了,旧社会留传下来的,格调相当地不健康。话传到郭家兴的耳朵里,郭家兴很不高兴。”这番话

[收稿日期] 2010-12-14

[作者简介] 姜珍婷(1972-),女,湖南娄底人,湖南人文科技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前后都是以作者口吻在叙述,但“格调相当地不健康”这一句,却是郭家兴在评价前面的话。联想到郭家兴在对玉米的身体进行占有时,格调是相当地不健康的。这样,这句“格调相当地不健康”,就把其故作姿态、故弄玄虚的官僚作派暴露无疑。还有,如“有庆家的一听到‘外勤内懒’这四个字脸都气白了,她认准了是婆婆在嚼舌头。有庆老实巴交的样子,放不出这样阴损毒辣的屁。”这短短的两句话,前一句是作家在叙事,而后一句却话柄陡转变为人物在发话,人物短暂的一亮嗓就把她敢说敢做,泼辣敏锐的个性呈现出来了。

让人物突破作者的遮蔽适时地出来说话,这是作家在作品中设置的一个个气眼,正是通过这一个个气眼的通风透气,作者出让了全知全能的立场,人物因此而成为可以言说的个体。于是,众多的诉说,各个主人公的声音,汇集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话语世界,让我们通过《玉米》看到了一个无限接近于20世纪70年代农村社会的生活本相。

二 反讽的手法

在对狂欢化理论进行阐释时巴赫金认为其具有四个范畴,其中第三个范畴是俯就,狂欢式使神圣同粗俗,崇高同卑下,伟大同渺小,明智同愚蠢等等接近起来。

中国的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一个荒谬的时代,其荒谬性在于把一切政治化,把政治神圣化。《玉米》作为一部有时代标记的作品,作家当然要在作品中展现时代的风貌并揭示出它的荒谬。那么该如何去其神圣化,使被神圣化的一切回归其本真呢?德国施莱格尔兄弟在批评莎士比亚作品时,将反讽上升到了形而上的高度,认为世界的荒谬性决定了反讽的存在,这是对世界荒谬性的荒谬反应^[1]。因此,毕飞宇在《玉米》中以无处不在的反讽击垮了自诩为圣者和智者筑起的高高祭坛,让读者在笑声中看到了他们的卑污、愚蠢。这正是反讽与狂欢化中的“俯就”精神相通的地方。作者在作品中把这一手法应用得圆熟自然,张力十足。

新批评主义者说“反讽是承受语境的压力,因此它存在于任何时期的诗中”,反讽是“一种用修正的态度来确定态度的办法”^[2]。毕飞宇在他的《玉米》中主要用降格和讽刺的方式来对所谓的神圣者进行辛辣的讽刺和冷峻的嘲笑。如“王连方和女会计开始了斗争,这斗争是漫长的,艰苦卓绝的,你死我活的,危机四伏的,最后却又是起死回生的。”这一段话写的是身为村支书的王连方与该喊作婶子的女会计的不伦性史,作者描述这样一件为人所不齿的事件却连用了斗争、艰苦卓绝、你死我活、危机四伏、起死回生五个主流意识话语常用的神圣而严肃的词,作者通过对这些词的降格使用对当时的革命腔进行了讽刺,让读者看到了所谓神圣和卑污的亲缘关系。又如“王连方做过很周密的思考,他时常一手执烟,一手叉腰,站到《世界地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的面前,把箍桶匠、杀猪匠、鞋匠、篾匠、铁匠、铜匠、锡匠、木匠、瓦匠放在一起,进行综合、比较、分析、研究,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里而外、由现象到本质,再联系上自己的身体、年纪、精力、威望等实际,决定做漆匠。”这段话写的是王连方因作风问题被双开后的从业选择。首先,作者以

戏仿的方式描写了王连方择业时的姿态语言,什么一手执烟,一手叉腰,站到《世界地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的面前,这正是那个时代电影中一切领袖人物进行重大抉择时的形象,作者的仿拟在暗合人物身份的同时又对当时的政治形态话语进行了无情的嘲讽。而接下来的箍桶匠、杀猪匠、鞋匠、篾匠、铁匠、铜匠、锡匠、木匠、瓦匠又再次对前面的语言进行了戏谑,在对立中确立了它们的统一性从而瓦解了崇高与卑下的界限。接下来作者又再次转换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进行综合、比较、分析、研究,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里而外、由现象到本质,再联系上自己的身体、年纪、精力、威望等实际”最后作者把话语又还原为生活形态“决定做漆匠。”通过两种话语的交替使用,作者让它们在对话中消除了差别,消解了前者的庄严与神圣,凸显了语言背后世界的荒诞逻辑。读者读到此,无不发出会心的微笑。这种语言风格恰好吻合着狂欢的精神,因为狂欢精神就是一种快乐的精神,自由的精神,狂欢式的世界感受张扬的是一种快乐的哲学,读者在阅读文本时发出的笑声与狂欢节上的笑有着共通的地方,它们是否定(讥笑)和肯定(欢呼)的结合,是死亡和再生的结合,它把讽刺的矛头直指所谓的崇高,并昭示着权力和真理的交替。

三 取象的粗俗

巴赫金狂欢化的第四个范畴是粗鄙,即狂欢式的冒渎不敬,具体表现为采用与人体排泄、生殖能力相关联的不洁秽语来指称或描写事物。

我国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一个政治话语统治一切的年代,人们一切的诉求都只能隐藏在政治话语形态之下进行言说。《玉米》中彭国梁给玉米写的第一封情书就是把爱意隐藏在政治话语形态下的一个典型。由此可见,当时浓郁的政治氛围给人性带来的压抑有多深,为了撕裂与突破,作家必然以一个截然对立的言说方式来进行反抗和放松,粗鄙化的选意取向正好顺应了这一要求。在《玉米》中毕飞宇以一系列的污秽意象打破了一切形式的不平等,让人的行为、姿态、语言都从制约中解放出来,在狂欢中回复到人性的原初。

“郭巧巧又不同了,这个高中二年级的女学生在外头疯疯傻傻的,说话的嗓门比粪桶还要粗,一回到家,立即变了。脸拉得有扁担那么长,同样永远生着谁的气。那肯定是冲着玉米去的了。”毕飞宇是一个善于运用比喻的行家,但与其他作品相比,《玉米》中的选象明显有鄙俗的特点,如上例中作家要写郭巧巧嗓门的粗竟用了粪桶来作比,要写她脸长居然以扁担来赋形。我们撇开这个比喻的形象性不谈,单从审美性来看,意象的选取就过于粗俗了,这与作家前期华美的倾向有所背离,但这背离并不是作家的退步反而是一种境界的提升。毕飞宇作为一个六十年代生人对政治话语遮蔽和压倒一切带来的压抑与荒诞是有切身之感和切肤之痛的。因此,他的反抗愿望才更加强烈,他的嘲讽才更有力度。比喻是一种立象以尽意的修辞激技法,毕飞宇在此选用的物象其实是为表现他胸中之意服务的,他的喻意就是要以鄙俗来对抗严肃,以污秽来消解崇高,借此,要在主流意识的话语

形态之外建立亚话语形态,在颠覆中获得解脱与自由,在重建中再拾轻松与飞扬。正如巴赫金指出的“在尿和粪便这两个形象中保持着与分娩、多产、更新、吉祥本质上的联系。”^[3]“狂欢节的世界感受,是有强大的蓬勃的改造力量,是有无法摧毁的生命力。”^[1]理解了这点就帮助我们打通了阅读作家这一文本的关键。

我们再看下面的语例“这样好看的衣裳,玉穗可是饿狗叼住了屎橛子,咬住了决不会松口的。”作家把对美好事物的追求比作“饿狗叼住了屎橛子。”这个比喻初听之下何其不雅,但正如一个严厉家教下的孩子偶尔说粗话一样,作家带给读者的是解除羁绊和约束后的轻松与愉悦,是大胆叛逆后的成就感,借用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常说的一句话“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同样,禁锢有多深,叛逆就有多烈。中国的六七十年代与欧洲中世纪的社会现状是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人们都过着常规的、十分严肃而紧蹙眉头的生活,绝对遵循官方所赋予的一切教条和规范。充满了恐惧、教条、崇敬、虔诚的常规生活和单一的意识形态造成的世界感受和世界观是荒谬而令人窒息的,因此他们同样都孕育了狂欢的欲望和需求。正因为如此,所以作者在作品中一次又一次地以鄙俗的意象来表示着对权威与神圣的不敬,宣泄着被禁锢的

生命热情。再看下面一段语料“美国的轰炸机飞过来了,它们在鸭绿江的上空投放炸弹,炸弹带着哨声,听上去像哄孩子们小便。”一场神圣伟大的战争,气势汹汹的强大对手,作者通过用这样一个低俗的意象就轻巧地瓦解了它的恐惧感和严肃性,不着痕迹地逃离出了主流意识话语的圈禁。而读者也以同谋人的身份充分享受着这种在破坏中进行创造的快感。

正如狂欢的目的就是要破除一切成规,消除一切约束,以违反普通生活的逻辑来进行彻底的颠覆一样,毕飞宇在他的《玉米》中就是以狂欢化精神带领着他的读者摆脱了独白意识和威权秩序,最后共同建构一个多元的自由世界。

[参考文献]

- [1] [俄]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北京:三联书店,1988:157.
- [2] 赵毅衡.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文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182-183.
- [3] [俄]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6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20.

Carnivalized Language Style of Corn

JIANG Zhen-ting

(Hunan Institute of the Humanitie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oudi 417000, China)

Abstract: Corn is a masterpiece of Bi Feiyu, a famous modern writer. The natural and humorous language style of Corn coincides with carnivalized narrative poetry studies of Bakhtin, former Soviet Union thinker. By multi-part narration, irony technique, and selecting from vulgar imag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akhtin's carnivalized art is reflected concretely.

Key words: Corn; language style; carnivalized art

(上接第86页)

- [7] 龙榆生.唐宋词格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160.

The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Tune of Buddhist Dancers

Composed by Tang Zhaozong

LIU Zheng-qia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541004, China)

Abstract: When ascending the Qi Yun Tower, Tang Zhaozong commanded musicians to compose The Tune of Buddhist Dancers. The nobilities and musicians all participated in its responsive composing. Through analyzing The Tune of Buddhist Dancers (Ascending tower to look up the Qin palace), this paper found that the poem song implied important political information. By means of the musical way of The Tune of Buddhist Dancers which was themed in “thinking of returning”, Li Ye (Tang Zhaozong) was actually making a call to convene loyalist troops from various quarters to safeguard the monarch.

Key words: Tang Zhaozong; The Tune of Buddhist Dancers; Qi Yun Tower; Han Jian